

小小油坊成了人口流动“指示器”

想看年轻人的脸 只能等到过年



弟弟的两个孩子，男孩(右二)六岁，女孩(右一)才四岁。弟弟与弟妹平时在外打工，仅过年才回家陪孩子，平常孩子只能由爷爷奶奶照看。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我的家在河南省项城市一个叫张庙的小村，春节到家里是在腊月廿五中午，而上次回乡还是半年前。

进了家门，爸妈都不在家。不用打电话我也知道，他们正在离家20多里外的乡镇忙活着油坊里的生意。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晚上约8点才能回家，这种忙碌从腊月一直到正月底。这要感谢镇上的打工潮，爸爸的油坊也成了返乡、离乡的一个指示器。

油坊生意的波峰，是打工者回家的时候，也就是过年前后几天，不仅是人多了要买香油置办年货，更多的是要出门做准备，因为家乡香油香，出门打工前总要带上十来斤，留着自已吃，或带到打工地送给朋友。

除了过年外的大部分时候，油坊的生意相对平稳。过年，是个有魔力的指挥棒，让本来空巢的村庄热闹起来。我们

村的表现就很明显，平时到村里走一圈，只能见到老人和孩子，若想见到年轻人的脸，就只能到过年了。

在老家过年那几天，爸爸妈妈十分高兴，这种高兴不仅因油坊买卖好，还因一年奔波在外打工的亲人能聚在一起。快过年了，我、我的弟弟和弟妹，还有叔叔、表弟都从外回来了。爸妈高兴，弟弟家的一双儿女也高兴。

弟弟家的两个孩子大的才6岁，小的才4岁，可弟弟和弟妹都顾不上孩子，要外出打工，而且一南一北，弟弟去沈阳，弟妹去浙江。弟妹说，外出打工，内心其实很复杂，孩子很难割舍，他乡其实很冰冷。而外出打工，不只是为了一年能挣几万块钱，而是因为在家乡似乎更能安放青春。要在看孩子中度日，她不甘，而由于乡镇企业少，工资低，要在村里或镇上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很难。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去工资相对较高，企业

密集的南方。

记忆中，乡村很平静，过年时热闹但也不会太吵闹，平时也不会太冷清。乡村的生活节奏很慢，房屋很古旧。

现在，几次回乡，村里的房屋变得更宽敞，打工挣了钱，不少村民翻新了房屋。外出打工的村民穿着也变得时尚起来，用着智能机，玩着微信，抢着红包。

乡里的路也变得更宽了，镇上的商店、超市多了，也能看电影了。无论是在精神生活上还是在物质生活上，村子都在向城市贴近。这一切仿佛昭示着农村的进步。可是，等年过完了，“更好”的他乡，总是比家乡更有吸引力。不少人宁愿舍弃家中几岁的孩子，外出打工。

住在乡村里的人，老的在逐渐逝去，年轻的在极力逃避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节奏、安土重迁的生活。

记忆里的乡村，似乎正在没落，无论是外表还是肌理。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

非农业户口的家庭 无奈成了“种植大户”

本报记者 甘倩茹

我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却也喜欢春节前夕商场街道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一片中国红的节日氛围。期待儿时的玩伴可以团聚，期待亲朋好友落座一堂，分享一年来的收获和失望。因为是女孩，过年的时候不必跟着大人挨家挨户地拜年，但是为了捡到更多能用的鞭炮，执意要求跟在家族“拜年军团”的后面，去各家各户捡鞭炮。那时候，“拜年军团”到了家有老人的邻里家中，总是一呼啦地跪下，用最古朴的方式表达对老年人最高的祝福。小小的我站在“拜年军团”的后面，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屁股，觉得他们真是搞笑。但是同时，邻人会抓一把瓜子、拿几个糖块塞给我，我看到不是奶糖还会当场拒

绝。拜年一圈下来，新衣服所有的口袋里都是各种糖果，和小伙伴分享的时候内心无比地快乐。

今年过年，里里外外忙活的依旧是母亲和奶奶。她们准备好了各种年货，让我有一种“每逢佳节胖三斤”的预感。不过，我内心清楚，绝对抵御不了母亲一流的厨艺。

到了年初一，各个家族的“拜年军团”像往年一样开始挨家挨户地拜年，到了各家，互道一声“过年好”。跪拜式的拜年方式越来越少见，个别仍在坚持的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过年时，城区的亲戚对母亲说，“家里没什么负担了，日子也算殷实，咋还伺候着土地？”这个话题一开，母亲的话匣子便收不住了。

父母结婚后，父亲有份正式的工作，母亲有着做衣服的

手艺，为了赶时髦，一家人除了母亲都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留着母亲的一点田地，是为了在村里能永远有个落脚的地方。

时隔多年，让母亲没想到的是，当时让村里人羡慕的“非农业”家庭，却成了少数依然种地的家庭。“老二老三(爸爸的两个弟弟)家不种地了，都扔给我，你不能让地空着呀！”母亲说。当初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妈妈一个人包揽了二叔三叔家的田地，后来越来越多的邻居不再种地，有些甚至央求别人种自己的田地。就这样，母亲成了“种植大户”，扔也扔不掉。年刚过，母亲开始操劳雇人种土豆，现在让她担忧的是，越来越少的帮人种地了，所以她得早作打算。“前几年，雇人种地还能讨价还价，可以挑人，现在找人都找不到了，年长的看孙子去了，年轻的哪还有在家的？”

一口包糍
满嘴家乡味儿

文/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这次过年，因为买不上返程的火车票，先从济南飞到厦门，再搭老乡的顺风车在高速上疾驰6个小时，才回到故乡。

是的，我是个潮，哦不，福建人。人生的前18年，都在闽西北紧邻武夷山的一个小山城邵武度过。如果从山东坐火车一路南下，当山路愈发崎岖盘旋，满眼的绿里多了几分鲜嫩水意，山丘上翠竹招摇，山头低低环着带状的白云，那便是我的故乡快到了。

脚踩上积水的路面，刚下过雨的天空浅蓝近乎透明。空气里湿漉漉的，因为太潮有一些闷。

到家那天已是大年二十九，临近晚饭光景，路边已有不少小店打烊。小巷转角发现一家小吃店门口摆着油饼摊，金黄的热油里，几块圆形扁平的油饼滋滋作响。当年单价五毛现已涨到一块五，但一口咬开炸得金黄酥脆的米浆外皮，舌尖触到芋头丝、瘦肉、葱花混着辣椒面的味道，瞬间唤起了年少晨起上学路上同样欢愉的味蕾回忆。“就是这个味道。”一块油饼下肚，湿漉漉的南方冬日黄昏有了暖意。

说来也奇怪，我的故乡，一个常住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城，独有的特色美食类可谓繁多，却难以在外地吃到。偶尔有形似的，兴致高涨尝一口，却是另一种味觉体验。

大年初四下乡走亲戚。坐在院子里，中午的日头晒得人暖洋洋的，忽然闻到一阵辣炒腊肉的香味。我从板凳上跳起，满怀期待问：“中午吃啥？”男主人、我的姨夫笑眯眯地说：“包糍！”包糍是我从小时起便最爱的食物之一，因制作麻烦一般只能在乡下亲戚家吃到。它不仅滋味丰美，而且现场制作，人人动手，别有一番全家参与的乐趣。

这种形似大饺子的食物，外皮和内馅要分开制作。皮先用粳米和糯米按比例混合蒸熟，再放入石臼中捣烂。这个过程需要两名熟手配合，一个力气大的男子使劲捣杵，一人及时翻动米团使受力均匀。打成香糯洁白的米团后，再搓成幼儿拳头大小的团子，放入木桶保温。另一边，馅料的炒制也要忙活大半个上午。腊肉、冬笋、豆腐干切丁，胡萝卜、长豇豆切细丝，少不了本地的辣椒，分别炒熟后再混合翻炒，趁热用大盆端上桌。一切齐备之后，大人小孩各自从木桶里取出米团，再从桶边琥珀色的蜂蜡里挖一点匀在手心，把米团慢慢搓成中间可以盛馅的碗状，装入喷香的菜料，锁边成形，即可大快朵颐。全家围着桌子，爱吃几个自己动手，捏的形状难看的还会被调侃取笑。“姨夫，这腊肉真香！笋也特别好吃！”我连吃三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嘴角漾起一丝得瑟：“腊肉是自己家入冬就做的，笋也是家里山上挖的。城里哪吃得到这个味道？”

走不出去的家乡美食，留在生养我的小城，让我相信变化中还有坚守，每一次返乡都变成一次味蕾上的寻根。



包糍的皮讲究爽滑软糯，杵制米皮的过程，十分考验力气和技巧，一般由家里的壮年男子负责。

遇见故乡
【农村老了】

新春走基层

B04 齐鲁晚报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李师胜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燕

农村的道路宽了，超市多了，村容整洁了，硬件设施逐年攀高。从这些方面看，农村似乎变得更加宜居，但延续乡村灵魂的村民却在“慢慢变老”。年轻人不愿把青春安放在土地上，而更愿意去大城市寻求自己的价值，即便是家中幼儿，也拴不住年轻人的心。幼子与大片的土地，留给了村中的老人。留守儿童、种植大户也就这样“被产生”了。